

湖北省哲学史学会举行1990年年会

——纪念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50周年

1990年5月6日至7日,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及所属道教学术研究会、武汉大学哲学系暨武汉荆楚书院联合发起,在武昌空军疗养院招待所举行1990年年会,与会的有来自湖北地区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学术团体等20多个单位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和青年理论工作者。年会以“纪念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50周年”为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首先,省社联与省哲学史学会的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对我省哲学史工作者在近几年的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及所取得的科研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接着,会议进行了专题报告和分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纪念《新民主主义论》发表50周年,就是要学习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和历史经验,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的文化遗产,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为当前“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很多同志还回顾了《新民主主义论》这部光辉著作发表的历史背景。《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名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最先刊载在《中国文化》1940年出版的创刊号上。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处于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毛泽东高瞻远瞩,从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出发,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说明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还着重总结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发展,批判了文化性质问题上的两种偏向,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和发展方向,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谈到其现实意义时,有的同志指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解决了当时中国人民对民主道路的选择这个重大课题。今天,我们又面临着多种多样的现代化道路而应加选择的重大课题,二者正好具有某种历史的衔接。所以,重温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很多同志都指出,《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也是中西、古今、新旧文化问题长期争论的总结。早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其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就提出: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可以说是自1930年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走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以来,经过十年的理论准备,尤其是哲学理论的准备(1937年发表《实践论》和《矛盾论》),所得到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为我党和我国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提供了伟大的政治战略及其理论基础和伟大的文化战略及其理论基础。就政治战略而言,毛泽东提出了系统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纲领,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特殊的新的民主主义道路,从当时的角度而言,这比马克思晚年对于东方革命特殊道路的思考(见《人类学笔记》和《给查苏里奇的信稿》等),比列宁晚年通过“新经济政策”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探索,要完备、深刻得多。就文化战略而言,《新民主主义论》全面总结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古今、新旧文化的论争,从而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战略。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毛泽东提出了具有明确主体思想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批判吸取外来文化和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指导方针。

有的同志还谈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认为新民主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可以分以下几个部分来论述:①《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②《新民主主义论》揭示了中国革命的逻辑,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逻辑的区别、联系和顺序,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级内容,特别是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同盟军的问题;③很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发现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明过的五种典型社会形态相区别的新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对这一社会的经济成分、阶级结构、过渡性等重要特征作了深刻的分析。

有的同志还着重探讨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的论述。认为毛泽东总结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西文化的争论。毛泽东提出了对中外文化都要批判继承的观点,既批判复古派,也批判西化论。他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想,完全跳出了当时的体用两概模式,而把问题放到世界的范围,从民族特性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的相互关系中去综合考察,强调科学和民主为其主要内容,并要通过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来逐步实现。那么,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呢?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里,毛泽东把文化的民族性放在首位,是特别具有历史眼光的。当时,中国是一个饱受外族蹂躏的国家,谈文化的民族特性,能激起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事实上,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在当时成了反抗敌人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当然,我们民族的文化,还必须“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毛泽东对于文化的这种看法,无论在当时抑或是在今天,都是十分正确的。由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世界整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要赶上先进的发达国家,不仅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同时,还要吸取国外的先进文化,当然是批判地吸取,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所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既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而是中外文化相交融的产物。

通过晚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人们既不满足于笼统的认同,也不停留在简单的辨异上,而是察异观同,综合融会,这是文化研究上的一大进步,但要在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时代精神的崭新哲学,仍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业。一大批近代哲学家,如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们大都力图创新,可结果又往往陷入复旧。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最新成就,“五四”以后传入中国,首先与中国革命实践日益深入地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保证;同时,也为总结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的一系列争论,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南。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一系列其他论著中,以其理论深度和政治优势,对晚清以来关于中西、古今、新旧文化问题的长期争论,作出了科学的总结,从而有了1949年的胜利。这样,近百年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经历了认同——辨异——会通等三个阶段,终于以马克思主义的总结而达到了一个螺旋发展的逻辑终点。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谈到了文化的另一特点:大众的。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里,毛泽东把民主看作是新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就把民主与科学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这种新文化,不仅要成为争取民族解放的号角,而且还要成为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用以提高人民的觉悟。当时,文艺大众化讨论是很热烈的,我们党也一再强调,文化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事实上,如果不对工农大众原有的文化素质进行提高和创造,任何价值观念的变迁、文化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我们正在从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的经济要现代化,我们人民的文化心理素质也必须现代化。因此,我们要接过先辈的民主与科学这面旗帜,使国民从传统的小农意识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让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开出更丰硕的成果。

会上还分别讨论了新的一年中,中、外哲学史研究的工作规划。最后,广大会员表示要在党的领导下,在社联的指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争取取得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把学会办得更好。

(金光鸿 别祖云)

(本文责任编辑 涂贇琥 何天齐)